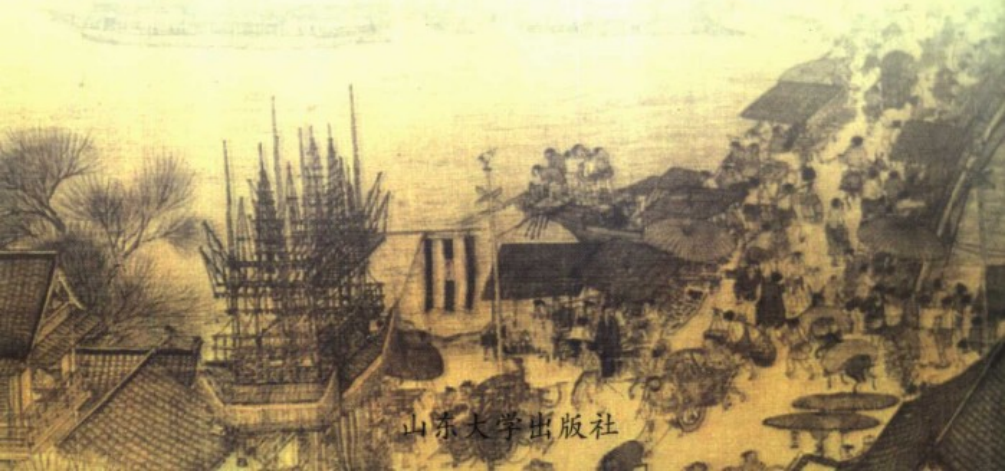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齐涛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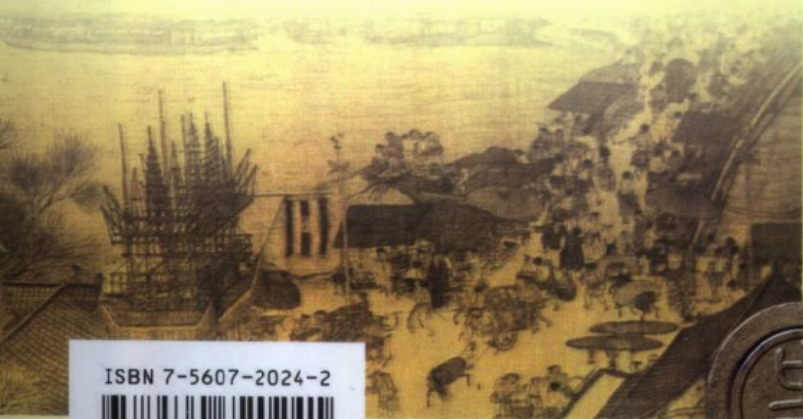
中国通史教程 | 第三版 | 古代卷



山东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林开甲

封面设计
午云



ISBN 7-5607-2024-2



9 787560 720241 >

定价: 28.00元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齐 涛 主编

中国通史教程

(第三版)

古代卷

本卷主编 李 泉 赵世瑜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通史教程:古代卷/齐涛主编;李泉,赵世瑜分主编.
—3版.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8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ISBN 7-5607-2024-2

I. 中…

II. ①齐…②李…③赵…

III. 中国-通史:古代史-高等学校-教材

IV. K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4431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22.25 印张 577 千字

2004 年 8 月第 3 版 2004 年 8 月第 6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三版前言

《中国通史教程》与《世界通史教程》出版于1999年6月,并于当年秋季投入教学使用。与以往的通史教材相比,这两套教材重在体现研究性学习与能力培养的主旨,试图做到给教师留下发挥的空间,给学生留下思考的空间,摆脱那种面面俱到、陈陈相因的固有模式。基于此,教材中的各卷均采用上、下编结构。上编立足于断代,以重大历史事件和重点制度、文化为主线,勾勒不同时代的历史进程;下编则选取贯穿不同时代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与讨论。为便于同学进一步的学习,每章之后均有“导读”、“思考与讨论”。

教材投入使用后,我们又组织进行了教学大纲的修订、师资的培训、教与学诸环节的改革,并举办了若干次教学研讨与教学观摩。与之同时,我们充分认识到,随着时代与学术的进步,任何教材都处在不断的落伍之中。因此,自教材使用之日起,有关的编写人员即开始了新的修订。在修订过程中,我们充分听取了任课教师 and 学生的意见,从体例的完备、内容的完善到新的学术成果的吸收都作了相应的努力,2001年6月,这两套教材的第二版正式面世。鉴于一些院校图书资料的局限性,为把研究性学习与能力培养落到实处,在第二版出版的同时,我们又组织编写了《中国通史教程教

学参考》与《世界通史教程教学参考》，包括了学习过程中需要掌握的学术动态、基本资料以及学术范文，作为课堂讨论和课下自修用书。让人高兴的是，自两套教材面世至今，在编写人员与有关各校任课教师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初步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2001年，该套教材荣获山东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当年5月，又获得了全国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目前国内已有百余所高校陆续选用这两套教材或指定为考研参考教材。

面对不断增加的使用者以及国内史学界对这两套教材的日益关注，我们惟一的选择就是不断修订、不断完善，紧随时代与学术的进步。自第二版出版后，我们又着手组织第三版的修订。本次修订的主旨是立足史学前沿，提升学术水准。为此，我们邀请了北京师范大学的赵世瑜教授，复旦大学的戴鞍钢教授，南京大学的张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李宏图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李世安教授与前二版的主要主持者、山东大学的顾奎斋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的夏继果教授，山东师范大学的王玮教授、郭大松教授，聊城大学的李泉教授、曹胜强教授，烟台师范学院的俞祖华教授等分别主持了各卷的修订工作。我们希望《中国通史教程》与《世界通史教程》以及与之配套的教学参考在使用过程中能够继续得到师生们的批评与支持，继续修订，不断完善，为历史学科的发展与历史教学工作作出应有的贡献。

齐 涛

2004年6月于山东大学老校

导 论

本书是《中国通史教程》的古代卷，讲述自远古至19世纪中叶计一百多万年的中国历史。关于“古代”，过去有上古、中古、近古的说法，即将先秦、秦汉时期归为上古，魏晋至隋唐为中古，宋至清为近古，现在已不采用了。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结束、近代历史的开端，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或以宋代为近世，或以明代中叶为近代等。本书所谓的古代，按照目前通行的划分，包括史前时代的历史和夏朝以降历代王朝的历史。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早在170万年前，在今天中国的版图内就已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此后，许多古人类文化遗址被陆续发现，证明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人类起源地之一。由此直至文明时代开始，通常被称为“原始社会时期”或“史前时代”。

对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根据古人类制造和使用的工具形制，考古学家将其划分为旧石器时期和新石器时期（或细分为旧石器、中石器、新石器、铜石并用等几个时期）；体质人类学家根据人类体征的进化，将其分为猿人、智人、现代人等几个阶段；而文化人类学家曾用蒙昧时代、野蛮时代等说法来概括它；以前也有哲学家或文学家用黄金时代、白银时代、英雄时代、传说时代等等对它进行比喻。后面这些说法由于明显带有时代的印记，早已被学术界弃用。

了。

无论对史前时代的阶段性划分作何称呼,这一时期的历史面貌还远未为今人清晰地了解。根据考古学家的努力,我们迄今已经知道,自人类起源后,从体征上日益脱离动物界,工具日益进步,婚姻制度从群婚向对偶婚进化。在距今1万年左右的时候,中国大地上的远古人类开始进行动植物的栽培和驯化,逐渐出现了氏族组织;而在距今4000~5000年左右的时候,在黄河、长江流域和其他一些地区,随着城池与宫室、青铜器、刻划符号、王权象征等等的出现,文明的曙光开始显现。

中国进入文明时代可以夏朝的建立为标志。长期以来,由于我们所讲述的夏朝历史,基本上依据的是周秦两汉时期古籍中的材料,没有发现直接的考古证据,因此学者们往往谨慎地将其称为传说中的夏朝历史。近年来,考古学家有了进一步的发现,夏朝历史的轮廓开始成形,但直接与夏朝相联系的实物或文字都还未发现。由于甲骨文的发现,从商朝开始,中国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商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影响向四外辐射,是一个相当成熟的青铜文明。继商而起的西周创立了宗法制、分封制和礼乐制度,统治区域扩大,社会不断发展。西周崩溃之后,中国开始经历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剧烈的变革时期到秦朝统一帝国的建立而告结束。

春秋战国时期,即周秦之际,是一个社会变动剧烈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生产力有了明显进步,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推动了农业的发展;较大规模的集体耕作方式逐渐让位于个体小农生产;宗法制和分封制遭到破坏,周天子的地位一落千丈;各国为争霸而纷纷进行变法,在变法过程中,旧贵族的势力遭到打击,军功爵制度、非世袭的官僚体制、郡县制度、法律制度逐渐建立起来;私营工商业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思想界异常活跃,儒、道、法等诸家思想成为后世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来源。这些变化标志着社会的转型,这一

转型到秦朝建立而基本确定。以往人们通常将此后的社会概括地称为“封建社会”。

与前代相比,秦汉两朝是空前的君主专制的政治大一统时期。秦朝的疆域东至海,西到临洮、羌中一带,南达象郡,北抵长城沿线,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之一。为了巩固大一统局面,秦统治者确立了皇权统治下的中央集权制度,在地方上设立郡县和基层管理组织;统一货币、度量衡和文字,禁止私学,焚毁诸子百家之书;但刑罚极为苛重,以致在不长的时间里,“天下苦秦久矣”,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民众反秦起义和六国旧贵族的反叛,最终灭亡了秦王朝。

汉朝继承了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度,但也接受了秦朝速亡的教训,在政权建立之初实行了清静无为的政策,努力恢复社会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初期的分封诸王的制度也因与中央集权政策相抵触而被逐渐取缔,皇帝亲自操控的“内朝”机构和中央掌握的地方监察体系逐渐建立起来。在政治结构上,皇帝、皇族、外戚以及功臣等居于等级结构的顶端,各级官僚、地方豪强、富商大贾等处于社会的中层,而广大中小地主、自耕农、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居于等级结构的下层,还有少量的奴婢、贱民等地位更加低下。正如学者们注意到的,这一时期虽然在某些部门存在奴隶,但并不构成社会上的主要生产者。在经济上,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更加普遍,国家进一步营建了许多大型水利工程,在社会比较安定的情况下,耕地面积和人口都有较大规模的增长,国力比较强盛。就全国来看,关中、三河、燕赵、齐鲁等地相对发达,巴蜀、荆楚、江南的个别地区比较繁荣,但南方的总体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在西汉武帝时期,统治者将儒家思想确立为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并影响到此后两千年的统治思想。由于国力强盛,汉朝在对匈奴的战争中逐渐取得了优势,有效的统治向西域扩展。

新的帝国体制确立之后,各种矛盾和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需

要不断加以调适和解决。汉武帝以后直至王莽统治时期,统治者先后采取了各项改革措施,但因无法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本质问题、策略失当、官僚系统效能低下等等,反而激起社会各集团的更大不满,矛盾更加激化,以至爆发了新一轮大规模的民众反叛运动,导致西汉的灭亡。东汉建立之后,虽有短暂的恢复发展,但官场腐败,党争激烈,豪强大族势力空前发展,不仅影响到地方的稳定,而且影响到政局。2世纪末3世纪初,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多民族政权长期分立的历史新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包括三国、两晋和南北朝三个阶段,通常被人们认为是一个长达四百年之久的动荡和分裂的时期。从长时段的历史眼光看,它也是一个帝国体制重新调整、社会秩序重建的过渡时期,是多民族汇聚、交流和融合发展的时期,是南方社会经济进一步开发和发展的时期,是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科学技术获得重要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世家大族势力继续发展,在九品中正制度的保护下,形成了保障贵族世袭特权的士族门阀体制,无论在政治权力还是在社会等级上,士族都具有支配性的地位。在这一时期,一些文人名士面对社会动荡纷争,或愤世嫉俗,或悄然隐退,玄学之风大盛;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由于其对生命的关怀,而在这个乱世赢得了许多信众。在这一时期,在南方经历了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政权的经营开发的同时,北方则在曹魏和西晋之后,逐渐从多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纷争的局面,演化为前秦、北魏等强大政权逐渐局部统一的格局。东晋南朝的官僚体制和北朝确立的军事、赋役、土地分配制度一起,共同影响了隋唐时期的制度创新。

隋唐五代时期是第二次政治上的大一统时期。在经历了以分裂动荡为外在特征的矛盾调适和问题解决过程之后,帝国文明焕发了新的生机。自北周而来的隋朝虽因徭役苛重和穷兵黩武,在人民反抗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过程中迅速崩溃,但却创造

了如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重要制度。在唐朝,三省六部制使行政效率更为提高,它既体现了君主对官僚机构的控制,也体现了官僚机构对君主的有限制约;科举制则有助于打破士族权力的垄断地位,加强了社会的流动性,刺激了人才的涌现;府兵制与募兵制相结合的军制,形成了较强的军事实力,使唐朝的有效统治区继续向外拓展。在和平和较为清明的政治局面下,社会经济十分繁荣,自由开放的社会风气使文化交流十分活跃、频繁,唐帝国因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文明中心。

中晚唐时期,一些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中央的控制力有所减退,出现了像“安史之乱”这样的大规模动乱,边疆民族频繁入侵,地方实力派拥有重兵,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中央财政出现危机,无法应付日益增多的各种危机。为此,统治者也不断进行了一些改革,虽然在当时效果不甚明显,但还是体现了对时代变化的努力适应。尽管如此,唐朝空前繁荣的思想学术、文学艺术及其辉煌成就,频繁而多彩的中外文化交流,并没有因中唐以后的政局变化而戛然而止,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并非完全停滞不前。从这一时期开始,经历五代十国时期直至北宋,又进行着一次新的社会变化。

到宋代,唐代盛时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因中期以后的社会动荡而完全停滞,反而在许多方面继续发展。比如在江南地区,由于少受战乱之扰,土地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和利用,农业产量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日益普遍,因此使唐后期财政对南方的依赖性增大。又比如政治上的混乱无序使得国家对于地方经济发展的束缚放松,流动人口规模增大,流动频率加快。唐中期以后均田制的破坏,还是说明这种土地国有形式在唐已难以存在。这种实际发生的情形,到宋朝则被体制所认可,宋朝“田制不立”或“不抑兼并”,正是从制度上驱逐了国家干预土地占有的做法,肯定了土地买卖和自由占有的趋势,这充分显示了大私有制的发展。

与此相适应的是,唐代力图确立的新的社会等级制度到宋代正式完成,这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结构上的重大变动。科举制度已经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由竞争走上仕途取代了血缘继承官位,构成了一个不断吐故纳新的精英集团,这与经济上的此兴彼衰是相应的。就社会下层而言,由于租佃关系的普遍化,契约关系开始取代政治依附关系,“客户”已不再是以前的部曲和典客。过去只有靠社会动乱才能打破的社会阶层或群体界限,这时已是在经常变化着的了。不仅社会的空间流动,而且社会的层间流动,到这时才频繁展开。

最引人注目的是城市的发展。它可以说是一种综合的象征,标志着从商业、社会阶层和集团、文化思想等多方面的变化。坊市制的打破表明城市变成一个比较自由的空间,不同的东西都可以集聚到这里,它不仅造就了经济的繁荣、知识的普及,带动了其他市镇体系的发展,更重要的是造就了思想的异端。意识形态的变化也是划时代的。从唐代的韩愈、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开启的人文主义思潮,到宋代蔚为大观。程朱理学到朱熹的一脉,叶适、陈亮等另一路向,都与传统的儒家理论有很大不同。文学上,讲究性情的特点发展起来,逐渐摆脱注经式的做法,与普通民众更接近的戏曲、话本和各种曲艺形式开始活跃,这都隐含着与统治者或统治思想对立的情绪。

我们之所以把宋到明初划为一个历史时段,是基于这一时期的如下特点:首先,政治多元与文化多元。所谓政治多元是指这一时期多个民族政权并立的局面。契丹人起于东北,后来占据了北方的广阔地区,建立了辽。党项人起于西北,建立了夏,史称西夏,对北宋也形成了威胁,但显然不被元朝以来的正统史观接纳为另一个正统政权。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女真人建立的金帝国灭掉了辽,继承了它的地盘,而后来的蒙古人又从金那里接收了中国北方的领土遗产。多元的政权导致了政治制度的多元、经济模式的多

元、语言文字的多元,以至文化的多元。这种情况同样到明初开始结束,但影响不可能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其次,随着上一时期的社会制度变化在北宋时期开始完成,官僚体制从宋代到明代有一种延续性,这就是中央集权的加强。当然对于辽、夏、金、元来说情况不同,因为它们往往还处在仿照宋朝建立体制的过程中,同时又要考虑到本民族政权的特色,但是中央集权化的趋势在它们那里也是很明显的。这个过程到明初发展到了极至。作为支配性的意识形态,理学在南宋获得较大发展,在金、元都没有遭到排斥和打击,直到明中叶以后才遭到挑战。

一般认为明初是个保守的时期,专制集权空前加强,思想控制极严,程朱理学得到大力提倡。变化从16世纪开始。一些学者认为,这条变化的线索一直延伸到20世纪。明中叶以后政治控制的松懈,使得社会流动变得频繁起来。商品经济发达,各种制品在世界市场上颇具吸引力,以至大量白银流向中国,进入中国的流通领域。一条鞭法和力役折银一方面体现了商品货币经济的空前活跃,另一方面也使劳动力从国家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这个过程到清代的摊丁入地最后完成。长江下游地区由于专业化市镇形成网络而出现城市化趋势,这个趋势在光绪时代到20世纪20~30年代在华北地区重演。民众识字率提高,绅士集团的作用日益突出,自由雇工的队伍壮大。在清代,中国的实际版图扩大了将近一倍,北、西、西北边疆得到相当的开发,人口从明初的7000万左右发展到明后期的将近2亿,再从清初的1.2亿上升到1850年的4.3亿。

明末清初的战争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清朝统治者在秩序重建的过程中则注重强化专制皇权、倡导程朱理学,加强社会控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清统治者一直对反清势力严加防范,多数文字狱的发生都与民族意识有直接关联,国内社会秩序的不稳造成多方面社会矛盾的激化;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整个世界到此时已经连成一个整体,清朝与各国的接触已经不可避免,清统治者担心

外部力量在国内的影响越来越大,加剧国内统治的不稳。但是拒绝英国使团提出的通商要求并不能解决清政府的忧虑,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西方殖民势力扩张世界市场与中华帝国保持“天朝”地位的直接冲突,并导致了此后一系列严重事件。虽然中国社会在短时间内尚未出现整体性的变化,但中国历史却从此增加了全新的发展主线,中国历史的面貌发生了新的改变。

中国是世界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中国古代文明是世界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把中国古代的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考察,有助于我们更加完整、准确地把握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通过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历史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古代文明史相比较,既有许多共性,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中国古代文明既是独立起源和发展的,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和趋向,同时也是在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古代文明甚至近代文明相互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发展和变化的。在宏观的比较视野下,我们更容易发现中国古代历史的特征。

中国古代文明与古埃及的尼罗河文明,西亚的两河流域文明,印度的印度河、恒河流域文明一样,都属于大河文明。与古希腊、古罗马的地中海文明不同,他们都属于农业文明。但是,中国古代文明又发生在东亚大陆上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东南临大海,西北接高原大漠,因此与密切接触、相互间频繁影响的尼罗河文明、西亚文明和地中海文明不同,它的发展独立性更强。在早期的文明发展中,几大古文明区不约而同地发展起城市、文字、金属冶炼技术,出现了权力集中的君主和伟大的思想家,虽然其中不排除文化传播的作用,但显然在以上这些方面具有比较独立的系统。

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中国逐渐发展起了一种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原有的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基层社会组织长期存留,成为君主国家的社会基础。集中体现这一特征的西周宗法制被打破之后,个体小农的经营方式取代了较大规模的集体劳作,但村社仍然

是社会的基本单元,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社会结构依然保持着。为了有效控制处于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而又幅员辽阔的版图,为了有效控制相对分散的个体农民,中国逐渐形成了一套专制集权的政权体系,不断强化着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即使是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起来的政权也概莫能外。基于此,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特点,并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教化等方面的手段,对这一特点不断进行强化。

与其他古代文明相比,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是其显著的特点之一。无论是由哪个民族建立的政权,他们都自认为承袭了前朝的正统,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前的政治经济结构和以语言文字、思想学术为基本载体的文化传统;后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前后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也总是努力从各个不同方面论证这样的传承关系。相比之下,其他几个古代文明的政治系统都在异族的冲击之下发生了断裂,这些地区的新统治者在文化上也与当地的古老文明并无直接的承继关系。

中国古代文明同样是在漫长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多元文化汇聚的结果。夏、商、周三代文明从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核心,渐次向四外扩展其影响,经秦汉大一统格局的奠定,融合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最后形成了今天的政治和文化版图。由于古代中国地形多样,民族众多,区域差异较大,虽然中央政令早就通达四方,但各地真正融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在时间上经历了先后不同的过程。秦朝的“书同文”使得操不同方言的族群有了同一交流媒介,具有高度影响力和凝聚力的礼仪文化可以借助这一媒介广泛传播,并得到较深程度的认同。文化认同超越了地域和族群的差异,造就了其他古代文明未曾有过的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无论是中国文明的多元性还是一体性,都成为它充满活力、自强不息、不断进取,而又保持其独特性、完整性的动力。

基于这种认识,即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连续性特征而非断裂性

特征的认识,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阶段性特征将更注重其自身的自然发展演变。我们将比以往更多地关注长期性、连续性、渐进性的发展过程,更多地注意结构性的变化。虽然历史上的某些重大事件往往被视为阶段性的转折标志,但实际上,重大的社会转型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成,往往表现为一个变化的时期、一个过渡性阶段,周秦之际或春秋战国时期、唐宋之际、明清之际等等都可以被视为这样的变化期、过渡期。同样,鸦片战争所引发的重大变化,也没有在短期内完成,政治体制、社会—经济结构、主导性的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转型,都是到20世纪上半叶后才逐步完成的。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是否曾存在以奴隶作为社会主要生产者的奴隶制社会形态,还没有充分、确凿的证据;“封建”是对西周“封邦建国”的一系列制度的指称,以后历代无论从政体上说,还是从社会制度上说,都很难找到西欧中世纪某些国家和地区实行的采邑制、农奴制、分封制的等同物;明清时期出现的市场经济因素也与西欧早期现代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尽相同。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道路的特点、模式还处在继续深入探索的过程中。

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中国古代史是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基础。学好这门课程,不仅要掌握基本的历史知识,逐渐熟悉、掌握、分析、利用历史资料,还要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增强对历史的问题意识。古人云:“学者有疑,有疑则进,无疑则退。”就是强调学习、研究中的怀疑精神、问题意识,将此作为学问能否进步的标志,这就是古人强调“史识”的重要意义。此外,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的方法,我们不仅要通过学习掌握基本的文献分析方法,而且要开阔视野,注意学习对研究历史有用的其他学科的方法,学好历史文献学、目录学、古文字学等传统辅助学科是很重要的,了解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知识也是很重要的。同时,不仅要时刻关心学术动态,注意新的历史资料的发掘,关注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重点,而且需要特别重视学术史脉络的梳理和把握,这

样才能使自己的学习和研究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才能避免人云亦云,才能有所创造,有所发明。

基于以上所述,我们在本书第二版的基础上,对全书的结构作了部分调整,按史前时代、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时期划分章节,各个时期增加了“社会生活”的有关内容,“导读”部分作了适当补充,在内容上对近年来的一些新研究成果作了一定程度的吸收。

本书第一版由李泉、傅永聚主持编写,具体分工如下:导论及上编第二、三、四、五、六章概述,李泉;上编第一章,崔大庸;上编第二章,袁坤、王秀荣;上编第三章,马亮宽、仝晰纲;上编第四章,江心力、梁国樞;上编第五章,郭学信、王云;上编第六章,王云、杨朝亮;下编第一章,赵强;下编第二章,杨春梅;下编第三章,任怀国;下编第四章,余同元;下编第五章,梁方健;下编第六章,刘德增;下编第七章,任怀国;下编第八章,张弘。2001年再版由李泉进行修订。此次修订依然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由北京师范大学赵世瑜教授主持修订,并根据此次修订的基本精神、按照原有部分的行文逻辑重新撰写了“导论”部分。各章的修订和补充工作分别是由王海燕(第一、二章)、邓庆平(第四、五、六章)、李留文(第三、七章)完成的。下编内容也作了较大调整,由第二版的8章调整为10章,由李泉主持编写修订。具体分工如下:第一章,江林昌;第二章,仝晰纲;第三章,任怀国;第四章,王晓丽;第五章,任怀国、荆世杰;第六章,余同元;第七章,梁方健、刘惠琴;第八章,刘德增;第九章,江心力;第十章,李增洪。最后由齐涛对全书进行审定。由于时间及学识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疏误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